

# 9·30运动和国家罪行第八章

## 苏哈托的角色（上）

原创 萧玉灿 印尼  
视角

来自专辑9·30运  
动和国家罪行

萧玉灿 著  
萧忠仁 编  
陈浩琦 译

### 苏哈托的角色

苏哈托扮演的什么角色？当然是很大的角色，甚至比苏加诺在这一事件所起的作用更大。

在9·30事件前几天，拉蒂夫曾来向苏哈托汇报，计划拘捕一些反对苏加诺政策的将领。苏哈托表示同意支持这一计划。

9月30日晚，实施绑架行动前几个小时，拉蒂夫又来见苏哈托，报告说，当晚会有绑架行动。苏哈托再次向拉蒂夫表示支持。

据说在此之前几天，苏哈托从雅加达之外调来了几个营部队，理由是来参加10月5日武装部队日庆典。苏哈托在雅加达亲自视察了这几个营。

问题在于：他作为陆军军官，在知道有计划要损害自己的上司时，有义务向陆军参谋长艾哈迈德·亚尼作汇报。

原来，他不只是不报告，而是一面承诺支持那个将绑架自己上司的群体，一面秘密地准备采取行动，以提高自己成为在印度尼西亚最有权力的人的可能性。

据说，夏姆是艾地与武装部队领导人之间的桥梁，而且还与苏哈托有关系。问题是，为什么苏哈托并不在9·30运动的绑架将军名单中？难道这不是意味着他被认为是印尼共产党的同情者，或至少不会



损害9·30运动？

苏哈托将军实际上很擅长于利用形势，为自己赚取好处并提高自己的地位。他并不像许多人所想的那么简单，那些人认为他是过分依靠“巫师”及其神秘学的人。

纳苏蒂安将军虽然逃脱了9·30运动的绑架，却控制不了苏哈托。苏哈托精心利用纳苏蒂安的支持和影响力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和军事地位。当他不再需要纳苏蒂安时，就让他靠边站了。所有被苏哈托视为竞争对手的或对其地位不利的高级军官，被逐一清除，甚至在必要时把他们投入监狱，例如普拉诺托·雷克索萨穆德罗将军。

让我们来看看苏哈托在陆军中是怎么发迹的。

在1946年7月3日事件时，还是中校军衔的苏哈托曾表示他支持苏达索诺将军，于是他加入了企图推翻沙里尔内阁的陈马六甲派的部队。

当苏达索诺派成功绑架沙里尔，陈马六甲的政治地位不那么稳固时，苏哈托巧妙地改变方向。他甚至与印尼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势力合作，挫败了陈马六甲领导的1946年7月3日政变。因此，苏哈托成了左翼政党包括印尼共产党和日后参与9·30运动的中级军官们所信赖的人。

1948年发生茉莉芬事件时，中校苏哈托被哈达总理派到茉莉芬，以确定是否有印尼共产党叛乱。

苏哈托因为参与镇压1946年7月3日政变有功，与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兼茉莉芬事件的主要人物苏马尔索诺关系良好。苏马尔索诺在茉莉芬欢迎苏哈托，并带他四处考察茉莉芬的形势发展。苏哈托证实，在茉莉芬并没有哈达政府广播所说的印尼共产党叛乱。城市运行从容有序，无任何叛乱迹象，红白旗依然飘扬在所有国家机关的建筑物上，看不到锤子镰刀旗。监狱也没有被印尼共抓捕的解除了武装的士兵。一切运行正常。

苏哈托已经把他在茉莉芬调研的结果向哈达总理作了汇报。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哈达对印尼共产党的立场。哈达继续按照美国的意愿，以印尼共产党在茉莉芬制造叛乱为由镇压印尼共产党。

苏哈托关于茉莉芬情况的汇报，使他进一步成为具有人民精神和坚定反对帝国主义立场的武装战士们所信赖的军官。

拉蒂夫上校是9·30运动中央指挥部的二号人物，与苏哈托关系非常密切。他在革命时期进攻日惹首府时曾帮助苏哈托获得好名声。当时，拉蒂夫在现场指挥战斗，但苏哈托获得了认可，其功绩被突出表彰。

1948年，荷兰在其第二次侵略中成功占领日惹。苏哈托领导的部队被普遍认为是抵抗荷兰最顽强的部队，成功从荷兰人手中夺回了日惹。在战场上指挥战斗

的正是苏哈托最钟爱的下属拉蒂夫。许多当年顽强战斗夺回日惹并使苏哈托声名鹊起的军官们，在9·30事件后被苏哈托拘捕。拉蒂夫上校被判处无期徒刑。印尼国民军的历史只提到苏哈托的名字，指他是从荷兰人手中夺回日惹的功臣。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是对历史的片面歪曲。

9·30运动中央指挥部的第一号人物翁东中校，也曾经是苏哈托最喜欢的下属之一。他在1963年印尼从荷兰人手中收复西伊里安的“曼达拉行动”中为苏哈托立下了汗马功劳。苏哈托和他的妻子茜蒂·哈蒂娜是翁东的媒人。苏哈托和茜蒂·哈蒂娜还作为嘉宾出席了翁东的婚宴。

如果没有翁东这样的勇敢和自愿的官兵空降到西伊里安，苏哈托将军作为曼达拉行动的指挥官肯定招架不住。本来并没有部队愿意空降到西伊里安。由于时间紧迫和为了维护苏哈托的好名声，翁东中校主动请缨，要求空降西伊里安。苏哈托十分感动和赞赏，亲自送翁东和他的部队到机场，并在翁东登上飞机之前拥抱他。

苏哈托与翁东中校以及拉蒂夫上校之间的亲密个人关系，似乎是苏哈托的名字没有出现在9·30运动的绑架将领名单上的原因。拉蒂夫上校在被审讯时清楚地表明，他们认为苏哈托仍然是他们的上司，甚至是运动的指挥官，致使拉蒂夫认为在实施9·30运动计划之前有必要向苏哈托报告此计划。

1978年，拉蒂夫

上校在雅加达的高等军事法庭上清楚地揭示，9·30运动之前他拜访了苏哈托将军两次。第一次在他家，报告有将军委员会要发动政变推翻苏加诺政府。第二次在1965年9月30日晚上。拉蒂夫上校承认是在加托·苏布罗托医院见到苏哈托将军，向他提交一份逮捕7位将军的计划。当时苏哈托将军由于儿子被热水烫伤而在加托·苏布罗托医院。

曾任美国合众国际社驻雅加达新闻局首席代表的记者阿诺德·布拉克曼在其《共产党在印尼的崩溃》一书中描述了她对苏哈托的采访：“……1965年9月30日晚上，在9·30运动开始

前几个小时，拉蒂夫上校在雅加达陆军医院拜访了苏哈托将军。苏哈托将军的儿子被热水烫伤后正在那里治疗。苏哈托将军说，拉蒂夫来见他说是关心他儿子的伤情，但实际上是想弄清楚他究竟在医院里干什么。确认苏哈托将军在医院忙着照顾儿子，于是，他便被调去实施运动，这样，苏哈托将军便不可能采取行动阻止将在几个小时内发起的运动。”

维特海姆教授在其一本书中指出，苏哈托接受德国《明镜》周刊杂志采访时给出了不同的版本。苏哈托回答《明镜》的问题时说：“1965年9月30日晚上大约11点，拉蒂夫上校从反叛阴谋集团来到医院要杀了我。但显然他由于有所担心而不敢在公共场所实施谋杀。”

苏哈托将军这两种不同说法肯定是被外国